

一线城市农民工社会保险参保状况及其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杨桂宏,康晓曦,杨 琪

(北京工业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北京 100124)

摘 要: 农民工群体社会保障建设是近年来学者对农民工问题关注的一个焦点问题。文章对“北上广深”农民工的社会保险参保状况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定量分析。研究结果表明: 农民工的参保状况依然推进缓慢,且不同就业身份、单位性质,对农民工社会保险参保率有着较大的影响。因此,提高农民工社会保险参保率,要从提升农民工就业质量着手,促进他们更多地从次级劳动力市场转入首级劳动力市场,这样才能加快农民工社会保障建设进程,推进农民工的城市化。

关键词: 社会保险; 一线城市农民工; 参保状况; 城市化

中图分类号: C915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1-0398(2016)03-0015-09

一、问题的提出

在我国,“农民工”也被称为进城务工人员,主要是指拥有农业户籍但在本地乡镇企业或者进入城市从事二三产业以工资性收入为主的就业者。这一群体从1978年的15万到现如今逼近3亿,从第1代农民工到第2代农民工,农民工群体在促进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方面贡献了自己最美好的青春,却在融入城市这一过程中,面临着“入城难融城”的“半城市化”的尴尬局面^[1]。面对农民工这样一个数量逐年递增且在就业、住房、社会保险、福利待遇等多方面处于弱势地位的群体,为他们提供必要的社会保障并逐步实行全面覆盖^[2],对于解决农民工半城市化问题,推进该群体城市化具有重要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城市中的社会保障体系逐步完成了从以计划经济时期的国家——单位保障制转向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国家——社会保障制的过程,几乎覆盖全体有城镇户籍的职工和居民。然而,由于我国长期实行城乡二元社会保障制度,也尽管农民工在城市就业,且近十多年来政府部门一直在推进这一群体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但农业户籍等各种原因使得该群体的社会保险参保率一直不高。

社会保险作为社会保障制度中的一个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不仅为就业者的生活提供了基本的经济保障,且在实现再分配的同时也促进了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作为城市中的弱势群体,农民工较城市职工而言,多从事着较为底层的工作,在工作中也承受着更大的风险。随着我国城市化、现代化脚步的不断加快,农民工已成为我国产业工人队伍中的主要生力军。完善这一群体的社会保障制度成为保障这一群体权益和健全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主要任务。

本文以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比较好的北京、上海、广州、深圳(以下简称“北上广深”)4个一线城市为研究样本。一线城市相对其他各级城市在农民工就业的规范性和劳动监管等方面要相对完善。考察一线城市农民工社会保险的参保状况与影响因素,对分析全国2.6亿农民工社会保险的参保状况具有较强的借鉴意义,同时对于完善农民工的城市化,推动新时期城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因此,研究一线城市农民工社会保险参保状况及其影响因素,不仅可以提醒相关政府部门重视农民工群体,保护农民工合法权益,为该群体在城市化过程中铺平道路,也可以为我国一线城市经济发展、

收稿日期: 2015-10-04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面上项目资助(15BSH125);北京市教委一般项目资助(SM201610005005)

作者简介: 杨桂宏(1972—),女,辽宁人,首都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协同创新中心研究人员,北京工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博士

产业升级、新型城镇化等关系国计民生的问题提供一些数据分析上的支持。

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体系是目前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目标,但是由于一线城市农民工的流动性较强,各地的社会保险政策不统一,尤其是各地保险之间不能顺利转接,导致农民工社会保险参保状况并不乐观。本文针对这一突出的社会问题,利用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于2013年所做的“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问卷”的相关数据,选取我国农民工聚集且具有代表性的“北上广深”4个一线城市的农民工社会保险的参保状况和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二、文献综述

(一) 国外研究现状

农民工是我国城市化过程中所产生的特殊群体。虽然大多数西方国家并没有出现像中国一样显著的城乡二元体制,但与中国类似的是他们都在某一时期出现过大规模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流动的现象,在国外这部分人口一般被称为流动人口或者外来劳动者。他们对这一群体社会保障制度的理论与实践为我国推进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的健全提供了借鉴。

德国:作为最早建设社会保险制度的国家,面对当时大量进入城市寻找工作的农民,于1927年颁布了《职业介绍法和失业保险法》,并在其中强制规定全体工人和职员都需要参加失业保险和医疗保险。德国以这种强制义务性质的方式“迫使”在德国城市中工作的农民工享有社会保险,提高了保险参保水平,实际也的确保护了农民工的权益。

英国:作为最早建立全面福利制度的国家,将“普惠制”作为基本原则,基本将养老保险覆盖到全体国民。无论是流动人口还是其他岗位的人员,只要符合退休标准,均可以无条件从政府部门领取养老金。从1601年颁布的《济贫法》,到1897年的《工人赔偿法》,再到后来的《国民救助法》,英国政府对于国民,特别是对于弱势群体的权益保障,其救助体系愈发健全和完善。

日本:作为亚洲最早确立起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国家,为了解决农业劳动力转移和大批农民进入城市之间的矛盾,早期的日本政府将关注点放在对农民的职业教育和培训上,为他们提供就业资源,加大对农村企业、工业设施的扶持力度,为农民提供较为优厚的农村就业福利政策,完善农村劳

动力的社会保险。由于日本对于工人实行终身雇佣制,社会保险的起步时间也较早,因此现在的日本已成为亚洲社会保障体系最健全的国家。

在国家社会保障制度建设覆盖农业流动人口这一群体的同时,西方社会对于这一群体权益保障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一些对于弱势群体的救助问题的探讨,他们更强调对于弱势群体提供就业、政策方面的支持,而并非简单地为他们提供社会生活保障。同时,国外对于弱势群体的权益救助的另一个主要途径是借助非政府组织、宗教慈善服务组织等,且政府组织和社会组织之间的协调、整合性较强,管理的整合性较高,基本做到了社会保险与经济管理的有机结合。

也有学者从社会公平的视角出发,如Robert M·Ball(1978)认为:农民应当与城市职工享有一样的福利,并主张将农民纳入参与社会保障的行列中^[3]。考虑到农民的收入问题,西方部分国家,如英国、瑞典、澳大利亚等,将农民列入非缴费性养老保险制度中,而日本等国家则由政府为农民缴纳养老保险,减轻了农民的经济压力。

(二) 国内研究现状

从现有的学术文献看,我国学者的研究结果大多表明农民工的参保率普遍较低,有些地区甚至出现了农民工退保的现象。对于农民工参保意愿不强和参保率低的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可以分为两大类。

一类学者认为:由于农民工的自身因素影响,使得该群体的参保率较低。谢勇等认为:农民工的个人收入水平低,对社会保险的认识欠缺影响了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险的积极性^[4]。朱力等认为:农民工的性别、受教育程度和工龄对农民工社会保险的现状有显著影响,且农民工办理社会保险的自觉性不高,目光较为短浅^[5]。雍岚等人通过分析西安市农民工的调查数据,认为农民工的性别、受教育程度、年龄和收入水平等因素对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险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而单位性质和务工时间等个人特质对农民工的参保意愿不存在显著影响^[6]。

另一类学者认为: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险的意愿与相关政策制度有着密切的关系。顾永红认为: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对农民工社会保险参与意愿有一定的消极影响。农民工过于依赖传统的农村社会保障机制,对于土地的依赖较高^[7]。姚俊提出如何解决农民工“城保”与“新农保”之间的选择和衔接问题,是国家相关部门需要明晰政策的部分^[8]。赵

玲认为:农民工受到传统观念的影响,对于社会保险的认知程度不高,加上我国社会保险的覆盖范围不全,二者共同影响了农民工的参保意愿^[9]。张晓龙认为:城乡户籍制度的差异使得农民工无法获得同等的社会保障,进而无法真正完成城市化,且由于缺乏针对农民工参保的法律规定,各地方政府的处理意见也不尽相同,加上监管手段单一,农民工参与社保的真实情况与问题很难得到应有的反馈与保障^[10]。

上述研究表明:我国社会保障制度还存在着一定的缺陷,没有形成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相关的法律、政策规定还存在着一些漏洞,这些制度在外因方面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民工的参保意愿。

从当前学术界对农民工参保意愿的研究中不难看出,现阶段的研究大多数侧重于农民工个体特征和制度层面影响因素对于农民工参保意愿的影响探讨,而对农民工参保率低的研究大多停留在对个体的定性分析,缺少对整体的定量实证分析。我国“北上广深”是4个较有代表性的一线城市,处于上述地区的农民工群体在全国农民工中具有相对较高的素质和特殊地位。他们的留城意愿、对社会保险的认知程度、需求程度等往往要高于我国其他地区的农民工。

本文欲从一线城市的农民工群体出发,以各项社会保险为自变量,以一线城市农民工与其他城市农民工普遍区别的个人特征作为因变量,其中主要包括年龄、文化程度、收入、职业、单位性质等7个方面。现阶段的相关研究显示:我国农民工群体中,女性普遍要比男性参加社会保险的意愿高,文化程度越高的农民工参保意愿越强,年龄越小、受教育程度越高、收入越高的农民工群体参保意愿越强。这些变量对于一线城市农民工的影响是否也如上文所述?拥有较为丰富就业机会的一线城市农民工,他们的参保意愿是否受到就业身份、职业类型、单位性质的影响?鉴于此,文章选择了上述变量进行研究考证。

从个人条件和社会两方面,分析各因素对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险的影响程度,进而更有针对性地为促进和提高农民工社会保险的参保率提供一定的思路和依据。

三、数据来源与研究假设

(一) 数据来源

本文以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在流入地组

织的“2013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为研究对象^①。本次调查覆盖了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以上述地区2012年全员流动人口年报数据为基本抽样框,采取分层、多阶段、与规模成比例的PPS方法进行抽样。调查对象为在流入地居住1个月以上,非本区(县、市)户口的15~59周岁流动人口。调查实际收集198795例流动人口个案信息。调查内容包括被访者基本情况以及就业状况、社会保险、居住情况等方面。

本文的研究对象以“北上广深”4个一线城市农民工群体为样本,选取了年龄、性别、单位性质、就业身份等多重变量,以分析影响一线城市流动人口参加社会保险的因素。需要说明的是,本文中所谈到的社会保险参保状况,均为在流入地参加的城镇职工社会保险,并不包括在其原籍(老家)参加的社会保险,以便于后文分析农民工市民化问题。

(二) 样本基本情况

如表1所示,在此次被收集回的198795例有效流动人口个案信息中,“北上广深”4个一线城市农民工为19974例。其中,上述4个城市的农民工所占比例分别为:38.6%、39.7%、11.2%和10.5%。男性农民工占总体比例的49.7%,女性占50.3%。在这一群体中,以80后新生代农民工居多(40.5%),年龄较大的50后农民工(占1.6%)已逐步退出劳动力市场。从受教育程度看,一线城市农民工多为初中教育水平(占57.9%),其次是高中教育水平(占16.8%),而大专、本科及以上学历的人员比例较低,这说明即使是一线城市的农民工,其学历也普遍较低。此次被访的一线城市农民工职业多集中在服务业、小商贩以及生产、建筑、运输等相关行业,分别占52.9%和26.8%;而他们工作单位的性质以私营企业(38.31%)或个体工商户(33.45%)为主,就业身份也多为雇员(57.7%)。一线城市农民工的月工资收入多集中在2001~3000元,也有部分在2000元以下,分别占37.25%和25.28%,收入普遍较低。

(三) 一线城市农民工参保的基本情况

一线城市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险的情况见表2,其参保率普遍较低,各地各项的保险参保率均在50%以下,大多数集中在20%~30%。其中,平均参保率最高的为城镇养老保险,占27.5%,最低的为生育保险占8.5%。由此可以初步看出:近年来,一线城市农民工整体的社会保险参保状况不容乐

① 数据来源于国家人口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司于2013年开展的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特此致谢!

表 1 变量名、类型、赋值和分布描述表

变量名	变量类型	变量值	样本分布 / %
性别	虚拟变量	0. 男	49.7
		1. 女	50.3
年龄	定距变量	1. 90 后	15.3
		2. 80 后	40.5
		3. 70 后	30.1
		4. 60 后	12.5
		5. 50 后	1.6
受教育程度	定距变量	1. 小学及以下	12.2
		2. 初中	57.9
		3. 高中	16.8
		4. 中专	6.0
		5. 大专	5.1
		6. 本科及以上	2.0
婚姻状况	虚拟变量	0. 未婚	22.3
		1. 已婚	77.7
职业类型	定距变量*	1. 商业、服务业、生产、建筑、运输等从业人员	84.4
		2. 专业技术人员	6.9
		3. 国有企事业单位负责人、公务员、办事员等	8.7
单位性质	定距变量*	1. 个体工商户	38.59
		2. 私营企业	44.20
		3. 三资企业	11.08
		4. 机关、事业单位、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	6.13
就业身份	定距变量*	1. 家庭帮工	2.8
		2. 自营劳动者	20.6
		3. 雇员	57.7
		4. 雇主	7.2
收入	定距变量	1. 2 000 元以下	25.28
		2. 2 001 ~ 3 000 元	37.25
		3. 3 001 ~ 4 000 元	17.90
		4. 4 001 ~ 5 000 元	10.40
		5. 5 001 ~ 6 000 元	3.36
		6. 6 000 元以上	5.81

注: 定距变量带“*”表示原来均是定序变量, 但为统计方便而将其近似看做定距变量。职业类型、单位性质和就业身份都是根据经验分析排序。

观, 各项社会保险平均参保率比例不到 1/3, 一线城市的大部分农民工仍然不能享有城镇职工的社会保障。

表 2 北上广深农民工在本地的参保率 %

项目	北京	上海	广州	深圳	平均参保率
城镇职工养老保险	18.6	30.9	22.3	38.3	27.5
城镇职工医疗保险	17.2	33.7	21.4	28.6	25.2
工伤保险	21.5	8.5	29.4	42.4	25.5
失业保险	16.5	21.5	17.1	27.1	20.6
生育保险	6.5	6.3	9.2	12.0	8.5

横向比较“北上广深”4 地农民工的各项社会保险参保率可以看出: 深圳和广州的农民工在上述 4 个一线城市中参加社会保险的比例较高, 这一方面与深圳和广州早期实行农民工城保模式有关, 另一方面也与深圳作为移民城市, 大量用工都是农民工, 全面提高社会保险覆盖率使农民工的社会保险覆盖率必然也会提高有关。与上述 2 个城市相比, 北京作为首都, 在 4 个一线城市中农民工社会保险参保率却较低, 这一方面可能与北京市早期实行农民工社会保险的分项过渡模式有关, 另一方面也与北京市的农民工占总体职工的比例不如深圳和广州高, 同时其就业相对而言更多集中在商贸、餐饮、家政服务等行业, 而没有深圳那样高比例的工厂工人有关。上海农民工的养老、医疗和实业参保比例都较高, 但是工伤保险参保率在 4 个一线城市中显著偏低 (8.5%), 不到排名第 3 位的北京农民工工伤保险覆盖率的 1/2。若排除调查数据的误差, 其中的原因有待探究。

(四) 研究假设

目前, 中国社会保险体系的设计原则是权利义务对等制, 在社会保险的缴费责任方面, 主要由国家、单位和个人三方承担相应的责任。分析研究影响农民工社会保险参保的原因, 从定性分析看, 大多从上述 3 个方面进行了研究。本文根据文献综述的相关分析和对问卷的初步统计可知, 农民工是否参加社会保险既与其自身条件, 如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和收入状况有关, 也受社会因素, 如职业、单位性质、就业身份等就业状况的制约。基于此, 本文提出研究假设。

从农民工个人因素分析, 在选择参加城保还是农保时很大程度上是受农民工未来发展预期的影

响,通过农民工的相关研究结论可知,新生代农民工在留城意愿方面要强于老一代农民工,因此提出假设1:农民工的年龄对农民工参保影响是反向的,即年龄越小,参保率越高;在性别方面,由于受就业的性别歧视因素影响,因此提出假设2:男性较女性而言参保率更高;在受教育程度上,由于受教育程度越高,对城市生活的预期越强烈,并且对社会保险制度的认知也会好于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农民工,因此提出假设3:受教育程度对农民工参保影响是正向的,即受教育程度越高,参保率越高;在收入方面,由于我国社会保险普遍是单位和个人都具有缴费责任,因此提出假设4:收入水平越高,参保率越高。

从社会因素分析,在农民工就业市场中,单位是否为职工缴纳社会保险费用是决定职工参保的一个重要条件。由于社会保险的强制性,单位本应都为在职职工缴纳社会保险费,但是企业性质不同,规范用工的程度也不同。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5:单位性质对农民工是否参保的影响显著,越是大型正规就业单位,其职工参保率越高;从职业地位分析,在被雇佣的农民工中,由于具有较高职业地位的农民工在劳动力市场中更受欢迎,其用工规范程度也相应较高。因此,提出假设6:职业层次对农民工是否参保影响显著,职业层次越高,农民工参保率越高;从就业身份讲,主要可以分为自雇和雇员身份,由于农民工作为雇主身份的企业规模小,就业并不规范。因此提出假设7:雇员身份的农民工参保率更高。

农民工是否参加社会保险,既受到个人因素的影响,也会受到社会因素的影响。由于社会保险的强制性原则,因此提出假设8:在个人因素、社会因素对参保影响程度中,社会因素对参保的影响程度占据主导地位。

四、一线城市农民工参保的影响因素分析

(一)变量的选择

本研究的因变量是“农民工是否参加城镇社会保险”,为了便于二元 Logistic 模型分析,本文将“不确定”的选项剔除,编码为虚拟变量,0为“没有”,1为“有”。

本研究针对“社会保险”分别对城镇社会保险的参加状况进行了二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根据相关分析结果,去掉不相关变量,将变量分为个人条件变量和社会条件变量。个人条件主要为个体特征和收入相关变量,社会条件主要是就业状况相关变量。

将这2类变量放入模型1和模型2中。

(二)一线城市农民工参保的影响因素分析

1. 养老保险参保的影响因素分析

第一,对于个人因素而言,个体特征对农民工是否参加城镇养老保险有显著影响。模型1引入了4个变量: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月收入。从回归结果看,年龄、受教育程度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越年轻的农民工,其城镇养老保险参保率越高。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农民工,城镇养老保险参保率也越高。

第二,对于社会因素而言,职业地位对农民工是否参加城镇养老保险有显著影响。单位性质属于国有企事业单位的农民工,其城镇养老保险参保率高于在私营企业工作的农民工。就业身份属于受雇型的农民工,其城镇养老保险参保率更高。

从经验和养老保险需求看,老年农民工的养老保险需求要远远高于年轻的农民工群体,但是为什么反而年青农民工参保率更高呢?这从模型1和模型2的比较中可以看出,年龄对农民工参保的影响在模型2中变得不显著了,说明真正影响农民工参保的因素并不是年龄因素,而是年龄背后的某一因素在发挥作用。对比分析发现,单位性质、就业身份和职业层次上,新老农民工差异明显,年轻的农民工在就业规范程度和职业层次上都要高于老一代农民工,而这是导致这一群体参保率高的真正原因,而不是农民工对养老需求所导致的。但是养老保险的推进一定是要以社会群体的老年风险和养老需求相吻合。因此,在推进农民工养老保险制度建设和实践中,农民工养老保险的参保问题更值得关注。

如表3所示,本文将个人因素、社会因素分别引入 Logistic 回归模型中,对于这2个模型调整拟 R^2 值的变化情况,从中可以看出对“农民工是否参加城镇养老保险”解释度的变化情况。在模型1中,个人因素的4个变量仅能解释7.9%的参保变化的情况,模型2在模型1的基础上导入了职业状况相关变量后,模型解释力提高到27%。由此可见,模型2引入的变量对农民工是否参加养老保险的解释力大增,也就是说社会因素对农民工城镇养老保险参保率具有较好的解释力。

2. 医疗保险参保的影响因素分析

第一,对于个人因素而言,个体特征对农民工是否参加城镇职工医疗保险有显著影响。模型1引入了4个变量: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月收入。从回归结果看,年龄、受教育程度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越年轻的农民工,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参保率越高;受

教育程度越高,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参保率也越高。

表 3 农民工参加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影响因素(Logistic 模型)

自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B	Exp(B)	B	Exp(B)
年龄	-0.047 *** (0.012)	0.954	-0.019 (0.013)	0.982
性别	-0.013 (0.041)	0.987	-0.088 (0.055)	0.916
受教育程度	0.433 *** (0.018)	1.542	0.300 *** (0.022)	1.350
月收入	0.009 (0.015)	1.009	0.081 *** (0.018)	1.085
职业			0.488 *** (0.067)	1.629
单位性质			0.945 *** (0.027)	2.573
就业身份			-0.201 *** (0.038)	0.818
常量	-2.233 (0.096)	0.107	-0.794 (0.181)	0.022
-2LL	15 434.775		11 976.371	
调整 R ²	0.079		0.270	

注: * <0.1, ** <0.01, *** <0.05 括号内为标准误

第二,对于社会因素而言,职业地位对农民工是否参加城镇职工医疗保险有显著影响。单位性质属于国有企事业单位的农民工,比在私营企业工作的农民工更倾向于参加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就业身份属于受雇型的农民工更倾向于参加城镇职工医疗保险。

对比养老保险,在医疗保险参保的影响因素中,年龄在模型 1 和模型 2 中的影响都显著,这说明年龄对于农民工的医疗保险参保具有影响作用。如果说在养老保险的模型 2 中,年龄的影响表现为不显著,很可能是新老农民工在就业规范程度和养老需求这 2 个方面的反向影响因素所致。而在医疗保险方面,农民工由于都有新型合作医疗,对城镇职工的医疗保险需求并不强烈,更何况就业不规范的农民工一旦出现身体健康问题,就业很难得到保证。因此,年龄在医疗保险参保影响因素的模型 1、模型 2 中都表现明显。

从表 4 中可以看出,个体因素、社会因素对“农民工是否参加城镇职工医疗保险”解释度的变化情

况。在模型 1 中个体因素 4 个变量仅能解释 7.4% 的变化情况,在模型 2 中导入了社会因素后,模型解释力提高到 27.8%。由此可见,模型 2 引入的变量对农民工是否参加职工医疗保险的解释力影响较大。也就是说,社会因素的相关变量对农民工是否参加职工医疗保险具有较好的解释力。

表 4 农民工参加城镇职工医疗保险的影响因素(Logistic 模型)

自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B	Exp(B)	B	Exp(B)
年龄	-0.068 *** (0.012)	0.934	-0.046 *** (0.013)	0.955
性别	0.015 (0.041)	1.015	-0.028 (0.055)	0.973
受教育程度	0.407 *** (0.018)	1.502	0.263 *** (0.022)	1.301
月收入	-0.011 (0.015)	0.989	0.064 *** (0.019)	1.066
职业			0.417 *** (0.067)	1.518
单位性质			1.004 *** (0.028)	2.730
就业身份			-0.159 *** (0.038)	0.853
常量	-2.040 (0.096)	0.130	-3.714 (0.182)	0.024
-2LL	15 390.678		11 859.676	
调整 R ²	0.074		0.278	

注: * <0.1, ** <0.01, *** <0.05 括号内为标准误

3. 工伤保险参保的影响因素分析

第一,对于个体因素而言,个体特征对农民工是否参加城镇工伤保险有显著影响。模型 1 引入了 4 个变量: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月收入。从回归结果看,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变量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越年轻的农民工,城镇工伤保险参保率越高;男性较女性参加城镇工伤保险比例要高;受教育程度越高,工伤保险参保率越高。

值得注意的是性别因素在养老保险、医疗保险中都没有显著影响,而在工伤保险中,性别因素表现出影响显著的特征。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农民工在城市就业中,男性较女性更多地从事着高风险、强体力的工作。因此,在工伤保险中才会表现出明显的性别差异。

此外,月收入方面,可以看到在模型1中表现并不明显,而在模型2中,月收入在加入社会因素的变量后影响明显。这说明从单一的月收入因素看,并不是收入越高工伤保险的参保率越高,但是在引入职业、就业身份和单位性质等因素的情况下,收入对是否参加工伤保险的影响则成显著。这说明在同样的社会条件下,收入越高,工伤保险的参保率越高。

第二,对于社会因素而言,职业层次和就业身份对农民工是否参加工伤保险有显著影响。就业身份属于受雇型的农民工,他们更倾向于参加工伤保险。职业层次越高的农民工工伤保险的参保率越高。

如表5所示,将个人因素变量分别引入 Logistic 回归模型中,对于这2个模型调整拟 R^2 值的变化情况,从中可以看出对“农民工是否参加城镇工伤保险”解释度的变化情况。在模型1中个人因素的4个变量能解释10.5%的参保情况,模型2在模型1的基础上导入了职业地位变量后,模型解释力提高到27.4%。由此可见,模型2引入的变量对农民工是否参加工伤保险的解释力影响较大,也就是说社会因素对农民工是否参加城镇职工工伤保险具有较好的解释力。

表5 农民工参加工伤保险的影响因素(Logistic模型)

自变量	模型1		模型2	
	B	Exp(B)	B	Exp(B)
年龄	-0.129*** (0.014)	0.879	-0.134*** (0.016)	0.875
性别	-0.214*** (0.048)	0.807	-0.177*** (0.063)	0.838
受教育程度	0.450*** (0.022)	1.568	0.297*** (0.026)	1.346
月收入	-0.009 (0.018)	0.991	0.065*** (0.022)	1.068
职业			0.519*** (0.084)	1.681
单位性质			0.927*** (0.032)	2.526
就业身份			-0.029 (0.045)	0.971
常量	-1.803 (0.111)	0.165	-3.651 (0.210)	0.026
-2LL	11 089.329		8 749.443	
调整 R^2	0.105		0.274	

注: * < 0.1, ** < 0.01, *** < 0.05, 括号内为标准误。

4. 失业保险参保的影响因素分析

第一,对于个人因素而言,个体特征对农民工是否参加城镇失业保险有显著影响。模型1引入了4个变量: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月收入。从回归结果看,年龄、受教育程度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越年轻的农民工,城镇失业保险参保率越高;受教育程度越高,城镇失业保险参保率越高。

从模型1和模型2的对比中可以看出,收入在模型2中的现实影响显著,这也说明在控制社会因素不变以后,收入对农民工失业保险的参保情况影响是显著的。

第二,对于社会因素而言,职业地位对农民工是否参加城镇失业保险有显著影响。其中,单位性质影响力最强,单位性质属于国有企事业单位的农民工,相比私营企业的农民工更倾向于参加城镇失业保险;就业身份属于受雇型的农民工更倾向于参加失业保险。

如表6所示,将个人因素、社会因素分别引入 Logistic 回归模型中,对于这2个模型调整拟 R^2 值的变化情况,从表中可以看出对“农民工是否参加城镇失业保险”解释度的变化情况。在模型1中个人因素的4个变量能解释7.8%的参保情况,在模型2中导入了职业因素后,模型解释力提高到22.5%,由此可见,模型2引入的变量对农民工是否参加失业保险的解释力影响大,也就是说社会因素对农民工是否参加城镇失业保险具有较好的解释力。

5. 生育保险参保的影响因素分析

第一,对于个人因素而言,个体特征对农民工是否参加生育保险有显著影响。模型1引入了3个变量: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从回归结果看,年龄、受教育程度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统计结果显示:越年轻的农民工,生育保险参保率越高;受教育程度越高,参加生育保险的比例越高。

第二,对于社会因素而言,职业地位对农民工是否参加生育保险有显著影响。就业身份对农民工是否参加城镇生育保险影响力较弱,但是职业、单位性质的影响力却很强,职业层次越高的农民工生育保险参保率越高,单位性质属于国有企事业单位的农民工生育保险参保率越高。

如表7所示,本文将个人因素、社会因素分别引入 Logistic 回归模型中,对于这2个模型调整拟 R^2 值的变化情况,从表7中可以看出对“农民工是否参加城镇生育保险”解释度的变化情况。在模型1中个人因素的3个变量能解释33.9%的参保情况,

表 6 农民工参加失业保险的影响因素(Logistic 模型)

自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B	Exp(B)	B	Exp(B)
年龄	-0.067 *** (0.013)	0.935	-0.048 *** (0.014)	0.953
性别	-0.048 (0.045)	0.953	-0.065 (0.057)	0.937
受教育程度	0.424 *** (0.019)	1.529	0.293 *** (0.022)	1.341
月收入	0.011 (0.016)	1.011	0.081 *** (0.019)	1.084
职业			0.280 *** (0.066)	1.324
单位性质			0.856 *** (0.027)	2.355
就业身份			-0.099 ** (0.039)	0.906
常量	-2.475 (0.103)	0.084	-3.947 (0.183)	0.019
-2LL	13 490.799		10 949.084	
调整 R ²	0.078		0.225	

注: * <0.1, ** <0.01, *** <0.05 括号内为标准误。

在模型 2 中导入了职业状况变量后,模型解释力提高到 45.4%。由此可见,模型 2 引入的变量对农民工是否参加生育保险的解释力影响大,也就是说社会因素对农民工是否参加城镇生育保险具有较好的解释力。

五、结论

农民工参加城镇职工社会保险的比例,既受个人因素的影响,也会受社会因素的制约。虽然在不同的保险项目上,上述 2 种因素的影响程度有差异,但是基本上社会影响因素要大于个人方面的影响因素。因此,对前文中的 8 个研究假设基本上得到验证。

在个人因素中,年龄和受教育程度影响都较为显著,这说明在不同农民工群体的生命历程中,他们对未来的期望和职业规划是有差异的。年轻的、受教育程度高的农民工更多地把自己的未来寄托在城市,因此在职业选择和就业规范程度上都会选择有上升空间的职业岗位,而不是把挣钱的多少作为职业选择的唯一标准。因为收入在这些模型中的影响,更多是在控制社会因素变量不变后,其影响才显示出显著性。而在农民工城市就业的社会保险的模

表 7 农民工参加生育保险的影响因素(Logistic 模型)

自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B	Exp(B)	B	Exp(B)
年龄	-0.068 *** (0.023)	0.934	-0.020 (0.025)	0.981
性别	19.544 (442.451)	3.075×10^8	19.740 (459.055)	3.741×10^8
受教育程度	0.597 *** (0.027)	1.816	0.503 *** (0.033)	1.653
职业			0.719 *** (0.108)	2.052
单位性质			0.628 *** (0.043)	1.874
就业身份			-0.601 (0.061)	0.548
常量	-23.200 (442.451)	0.000	-23.703 (457.055)	0.000
-2LL	5 764.920		4 319.171	
调整 R ²	0.339		0.454	

注: * <0.1, ** <0.01, *** <0.05 括号内为标准误。

型中,性别对参保的影响很少显示出显著性(除工伤保险外),这也说明在城市化进程中,或者说在一线城市农民工的就业过程中,很少表现出性别歧视。这与一线城市在第三产业快速发展过程中,女性在现代服务行业方面就业具有一定的性别优势有一定的关系。同时,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摒弃了就业过程中的性别歧视现象。

在社会影响因素中,就业状况对农民工是否参加社会保险影响显著。其中,单位性质和职业地位在对农民工参保影响的 5 个模型中都显示显著,而就业身份除在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中影响不显著外,在其他的模型中也都显示显著,这说明上文提出的关于社会因素对农民工参保的影响也基本上得到验证,即职业地位高、就业单位规范、处于被雇佣身份的农民工社会保险的参保率要高于职业地位低、就业单位规模小且不规范和自雇(自营)的农民工。从农民工的就业身份与社会保险的交互分析可以看出,参保率的高低顺序分别是雇员、雇主、自营劳动者和家庭帮工。一般来讲,雇员身份农民工用工规范程度较农民工个体自营和小规模的私企要好,因此其参保率也要高些。而就雇主身份而言,虽然他们参保的经济负担不是问题,但是由于参保对于他们来讲是一种自主性行为,这笔钱用于投保远没有

投资企业所产生的效益多。理性思维的结果使这一群体的参保率低于普通的雇员。自营劳动者的经济状况要差于雇主,因此参保率更低。家庭帮工身份用工规范性最差,参保率最低。因此,在5种社会保险的模型2中,就业身份除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外都直接影响了农民工的参保率。

通过对农民工社会保险参保率的影响因素的定量分析,进一步验证了学者多年来的定性研究结论。在推进农民工社会保险制度建设和实践的过程中,不仅需要我国相关部门不断完善相关的参保制度,还要在农民工个人素质、用工规范等方面做文章。农民工大量的非规范用工,即使政府的人保部门再

加大工作力度,恐怕提高农民工参保率的效果也会收效甚微。因此,只有让农民工自身素质得到提高,包括受教育程度和职业技能的提高,他们才会在自我职业生涯规划和城市化的未来预期等方面有着更高的要求,在自我保障权益的诉求下,这一群体自身才会成为社会保险参保的重要社会监督力量。从就业的社会因素看,也只有农民工自身素质得到提高,他们才会从劳动力非正规就业市场进入正规就业市场,进而职业地位和单位性质的规范程度也才会有相应的提高和保证。提高农民工自身素质的过程,也是我国产业转型、不断更新的过程,更是推进农民工市民化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

参考文献:

- [1] 王春光. 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合问题的认识[J]. 人口研究, 2010(2): 31-34 + 55-56.
- [2] 景天魁. 底线公平: 公平与发展相均衡的福利基点[J]. 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1): 1-7.
- [3] BALL R M. Social security, today and tomorrow[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8.
- [4] 谢勇, 李放. 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险意愿的实证研究——以南京市为例[J]. 人口研究, 2009(3): 63-70.
- [5] 朱力, 吴炜. 农民工的社会保险状况与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江苏省调查数据[J]. 学海, 2012(2): 59-66.
- [6] 雍岚, 孙博, 张冬敏. 西部地区从业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需求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西安市农民工的调查[J]. 西北人口, 2007(6): 25-28 + 33.
- [7] 顾永红. 农民工社会保险参保意愿的实证分析[J].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0(3): 14-19.
- [8] 姚俊. 农民工参加不同社会养老保险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江苏五地的调查[J]. 中国人口科学, 2010(1): 93-100 + 112.
- [9] 赵玲. 影响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险积极性的因素探讨[J]. 科学咨询(决策管理), 2008(7): 21.
- [10] 张晓龙. 城市农民工社会保险制度探析[J]. 法制与社会, 2008(2): 237-238.

Research on First Tier Cities Particip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Social Insurance

YANG Gui-hong, KANG Xiao-xi, YANG Qi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Beijing 100124, China)

Abstract: Recent years, many scholars focused on the social security of migrant workers, to understand the social insurance participation situation of the group. The paper selected four first tier cities in our country, making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social security particip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in these cities; we think different employment status, nature of units etc. have impacts for migrant workers' social insurance rate. Therefore, to improve migrant workers' social insurance rate, we shoul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employment of migrant workers first, promoting them from the secondary labor market into primary labor market, promoting urbanization process in the group.

Key words: social insurance; migrant workers in first tier cities; the state of participation of social insurance; urbanization

(责任编辑 刘健)